

地方文化研究

辑刊

· 第十二辑 ·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主办

地方文化 研究辑刊

DIFANG WENHUA YANJIU JIKAN

· 第十二辑 ·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正强
责任校对:杨合林 袁 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第十二辑 /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
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编.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690-0743-5

I. ①地… II. ①西…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5022号

书名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十二辑)

编 者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743-5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21.25
字 数	536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 开发与应用 •

巴文化及其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共享开发

——以巴中为主要例证的初步探讨	彭邦本 (3)
悲情与繁华交织：南京历史文脉追寻	张祖群 (15)
论成都三国特色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	冯 婵 (25)
遂宁市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	胡传淮 陈名扬 (35)

•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

发现并快乐着

——岷江流域 2015 年度田野考古成果撷英	陈 剑 (47)
“都江堰”之前的都江堰	林赶秋 (70)

茶文化发祥地

——都江堰市	王克明 (87)
--------------	------------

地方文献与文学史书写

——以都江堰灌区文学整理为例	曾晓娟 (101)
----------------------	-------------

• 四川名人研究 •

司马相如对《文心雕龙》成书的影响	王万洪 (111)
从李新论史看其历史观	杨胜宽 (127)
张问陶青少年时期的从军意愿与英雄之志	
——张问陶的战乱诗歌与军事思想考述之一	郑家治 (138)
张澜实业教育思想对应用型本科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启示	李 艳 (153)
阳翰笙评传 (一)	徐志福 (160)

浅论阿来在《空山：机村传说》中对真实藏地的还原	张雪梅 曾虹佳 (168)
-------------------------------	---------------

• 地方文化与文化中国 •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时空意象	贺玉洁 (177)
宋代四川民族关系治理中的不生事原则述论	官性根 (185)
元末至明末湖广入川移民考察	李映发 (193)
李于锴诗歌中的“悲”感与“豪”气	
——从《写经楼诗草》看李于锴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	周日蓉 (212)
民国时期西康边茶的生产及贸易研究	陈沛杉 (219)
浅谈重庆的劳动号子	胡 牧 (226)
四川德阳方言连读变调现象考察	饶冬梅 (237)
苍溪石马镇方言音系研究	王 坤 (244)

• 序跋与文献 •

慎思：德艺双馨的前行基石	
——读方永江《且思：苏祠外浅尝》	张志烈 (263)
“沈本《三国》”是怎样成就的？	沈伯俊 (268)
成都杜甫草堂藏元刻杜集蕴含的信息	刘晓凤 刘晓玲 (274)
中华书局排印本《万历野获编》断句疑误偶录	杜学林 (280)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选择	张邦铺 王黎黎 (291)
试论“非遗”民间习惯法保护的利用与完善	丁 莺 (300)

• 口述历史 •

原川军将领口述历史（上）	何 宁 (311)
四川省丹巴县嘉绒藏族民俗口述史（一）	
——节庆民俗篇	李 钊 (322)
从禁烟到基督教，再到民主改革	
——秦和平教授访谈录	陈 鹤 方 泽 (329)

开发与应用

巴文化及其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共享开发

——以巴中为主要例证的初步探讨

彭邦本

内容提要：巴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区域和族群文化之一，文化资源极其丰厚且富含诸多优秀因素。历史上的文化区，往往也就是经济区，这是由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合乎规律性地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依循文化区系来规划协调区域综合发展，具有近乎天然的客观合理性和规律性。巴文化区地跨几个省市，跨省行政整合难度显而易见。而从文化协同的角度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行政藩篱，整合和共享开发资源，引领和推动区域文化、经济和社会全方位持续发展，可谓真正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巴文化；文化资源；共享开发；跨省合作

在我国很早以来就形成的多民族、多区域宏大格局中，巴文化是幅员广袤、最为古老、极为重要的区域和族群文化之一，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区域和族群文化之一。对于这一富含诸多优秀因素的传统地域文化及其丰富资源，怎样科学地保护、弘扬和共享开发利用，是摆在位于四川、重庆和陕南、鄂西、湘西、黔北等地传统巴文化区面前的共同历史使命。

一、巴文化及其界定范围

巴文化作为在上古就起源、形成，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区域文化，其内涵极其丰富，积淀甚为厚重，可谓博大精深，特色鲜明；其表现形态或曰外延则多元多样，可谓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对于这一源远流长，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几十年来，学界对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起初，学者往往将巴文化直接理解为先秦时期巴国的文化。巴国的文化，就是巴文化，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巴国早在公元前316年亦即战国中期就已经灭亡，而巴文化还存在和发展了很长的时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可见巴文化绝不等同于巴国文化。显然，仅仅以巴国为历史悠久的巴文化承载时空范围，并不合于历史上巴文化的实际，因为巴文化包括巴国文化，并且大于巴国文化。因此，随着研究和认识的发展，学者或又主张应以巴人亦即古代巴这个族群创造的文化为巴文化。

巴族创造的文化自然为巴文化，但问题是巴文化并不仅限于巴族文化。具体说来，此说的主要不足是，即使是先秦时期的巴国之内，生存蕃息的族群也不止巴人一族。按上古惯例，一国或一定地域之内，族群往往都是多元或曰多源共生的。各族群固然依族系聚居，但在该国或该地域范围内，往往又形成不同族群的聚居之地交错杂居的情形，亦即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可见，即使在“巴”或“巴文化”空间范围内，也并非只有巴人族群，而一般是巴族居于核心支配地位的族群多元和多样性并存互动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与巴并不同族，甚至也不同源，但又长期受巴文化主导、浸润和影响的族群及其文化，其实也可以纳入广义的巴文化范畴，或曰可以进一步丰富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更重要的是，巴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也和巴国一样，乃历史范畴。中古以后，尤其晚近以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族体，巴族与其长期主导影响下的其他族群多已经不复存在，主要融汇于汉族，因而巴文化遂由族群文化完全转化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地域文化，而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区域或曰地方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强调将巴族作为确认或划定巴文化的依据，最终反而失去了依据。

这样，就有了将巴地文化视为巴文化的观点。《华阳国志·巴志》简括巴的范围云：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樊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①

这本来是东晋历史学家常璩对先秦巴国疆域的概略追述：北边到了今陕南，东边到了今重庆市的奉节、巫山一带，西边抵达今四川省的宜宾，南边就到了今天渝、鄂、湘、黔相邻地带。但这实际上主要只是战国时期的巴国版图，与此前巴的疆域范围已有差异，即使相对于西周春秋时期也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如《左传》昭公九年就记周王室的大夫詹桓伯说：

武王既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②

可知巴、濮、楚、邓等国在西周之世均为周之南土，从其中邓在河南南阳地区，又可知巴与河南南部和广大江汉地区的百濮国族群落杂处。因此之故，《左传》中屡次记载春秋时期巴国的重要活动地域，就包括汉水上游和中游地区，与西周初年的情况仍大致相符。而前引《巴志》简括巴的范围“东至鱼复，西至樊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就没有包括广大汉水中游地区，这就明显不合于巴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再如常璩所谓“南极黔涪”，实际上就涉及今天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市毗邻的相当广阔的地域，例如当时巴的疆域包括了贵州境内的乌江中下游流域，因为传统巴的范围就一直沿乌江上溯到至少遵义一带。而

①（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5页。

②《左传·昭公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8页。

黔北的这一大片地方，直到清雍正年间，才从四川划归贵州的。

此外还应当注意，巴文化辐射所及，更远远大于上述范围。所以，研究巴文化，还不能只关注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确认的巴地。巴人或曰巴族支派纷繁，历史上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一些支系往往因自然尤其社会和人为的原因，历经分化、播迁、重组和融合，甚至迁徙到了颇为遥远的地方，并把巴文化带到了上述巴国、巴地以外的居息之地。如战国时期楚国大臣宋玉《对楚王问》就称：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①

郢，郢都，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当时天下著名的大都市，遗址为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纪南城。所谓下里，即乡里；巴人，则指生活在楚国（主要是下里）的巴地或巴族移民。而《巴人》，显然指战国时代巴移民带来的广泛流行于楚国民间的一种歌曲，以致后世一般用它来喻称社会上通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但这个故事还生动地反映，战国时期疆域最广辽的楚国范围内，甚至其郢都城内，已经生活着大量来自巴国、巴地或巴族的移民，其文化在楚地甚至楚都城中，都流行甚广。

再如《山海经·海内南经》云：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②

对于巴文化的这一神奇传说，袁珂先生考证云：

《淮南子·本经篇》云：“羿断修蛇于洞庭。”《路史·后纪》十以“修蛇”作“长它”，罗萍注云：“长它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侧。《江源记》（即《江记》，六朝宋庾仲雍撰）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岳阳风土记》（宋范致明撰）亦云：“今巴蛇冢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又云：“象骨山。《山海经》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谓之象骨港。”是均从此经及《淮南子》附会而生出之神话。然而既有冢有庙，有山有港，言之确凿，则知传播于民间亦已久矣。^③

这一“传播于民间亦已久矣”的神话故事，其实并非纯为附会之说，而是有古老的史实素地深蕴其间，应是信奉龙蛇的巴人族群的一支迁徙至洞庭湖岳阳一带以后留下的远古文化传说。

各方面的资料反映，巴人的迁徙远不止此。在传为西汉末年成都大学者扬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中，记载了蜀地杜宇王朝晚期遭遇“若尧时之洪水”的古老传说：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时之洪水，望帝不能治，

① 此记载见于刘向《新序》。《对楚王问》接着说：“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可见《下里》《巴人》是当时楚都城中最流行的音乐作品。

② 《山海经·海内南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③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282页。

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①

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两周之际，传说最终完成这次极为艰巨的治水使命的，是来自荆楚地区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鳖灵。《蜀王本纪》并称“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让”^②。《华阳国志·蜀志》亦载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③。对于这则关于蜀地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王朝建立的神奇传说，童恩正先生明确指出，开明氏“应该是巴族”，并引述大量考古资料为证。^④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文献中“鳖灵”或又作“鳖令”，“鳖”地在今遵义一带，上文已经指出，这里正是传统的巴地。由此看来，“鳖灵”或曰“鳖令”本为巴人之说，确有一定依据。当然，先秦时期蜀国最后一个王朝统治集团开明氏是否出于巴人，固然可以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战国时期蜀地存在大量巴文化因素，则是学界多数人的共识。大量带有巴文化风格的出土资料反映，巴人中的若干支系确实因种种机缘，至迟于东周时期来到了传统蜀地。

综上所述，今天来考察巴文化，显然应取广义的界定，其创造主体包括历史上巴国、巴族群和巴地先民，其地域包括今重庆市全境和湘西部分地区，陕南汉水上游、鄂西汉水中和清江流域，贵州乌江中下游流域，四川省境内则包括川北至川东的嘉陵江、渠江流域，以及涪江以东、沱江下游部分地区，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风格特色鲜明、传承地域广袤、辐射范围更是颇为辽阔的区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承至今的巴文化区域范围内，支系众多的板楯蛮巴人，曾长期是巴人共同体中人数众多的重要族群，而其集中聚居之地，亦即大巴山麓的渠江流域，无疑长期处于巴文化的腹心范围内，亦长期保留了极为典型的巴文化传统特色。

二、巴文化特色资源：以巴中为主要例证的分析

历史上广义的巴文化，可分为精神、制度和物质三大层面。其中的组织制度层面虽也简略地见载于传世文献，但其制度本为感官难以触及的昔日抽象社会存在，而且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故可以暂且基本不计。因此，盘点现存巴文化遗产资源，按社会发展视角，大致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层面。或按其遗产表现形态，采用近年来新的术语，亦可主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研究和梳理的方便起见，下面谨从精神和物质文化视角，结合实际例证，对巴文化特色资源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巴文化的精神文化层面，其内涵、外延可谓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学者或将其核心精神或核心价值，非常精炼地概括为“忠勇节义”或“忠勇信义”，我亦曾结合史实对之做过一

① 《蜀王本纪》，引自《全汉文》卷五十三，（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本，黄冈王氏木刻本。

② 《蜀王本纪》，引自《全汉文》卷五十三。

③ 《华阳国志·蜀志》，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182页。

④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73页正文及注释2。

些解读阐发,^①并在其基础上补充了“开放包容”“认同中华”两条,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巴文化核心精神和核心价值的认识。

与上述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相应,千百年来,巴文化在精神领域里衍生形成的资源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而又极具特质。据传世文献记载,商周之际由巴人充当前锋的“武王伐纣”,和“巴人射虎”“秦巴会盟”“巴楚联姻”等勇武雄浑、遐迩闻名的历史故事,就千古流传,影响深远。而“廪君掷剑”“土船竞技”“盐水女神”以至“巴蛇吞象”等神秘无穷、瑰丽多彩的神奇传说,无不脍炙人口,充满文化魅力和想象力。至于大气磅礴、载歌载舞的巴渝舞,则不仅具象生动地反映了三千多年前武王伐纣,改变华夏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其升华提炼于真实史事的音乐舞蹈,更是历代驰名天下的艺术经典,至今令人神往。

巴渝舞的名垂青史和千古流传清楚地反映,历史上的巴人和巴文化区,音乐舞蹈艺术甚为发达,因而《华阳国志》的《巴志》就褒扬其人其地云:

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②

这是前人对当时巴地文教昌明,文化繁荣,人才辈出,社会和谐的高度赞美。而巴地自古以来的所谓“歌咏之音”和“风谣”,则往往生动地反映了巴人从士绅到乡党平民的能歌善舞,以致直到晚近的巴地,上述巴人风韵仍存,不仅有“天性劲勇”、浪漫豪放的“巴渝舞”继续演绎承传,而且有士民共同吟诵的大量竹枝词。而今充满传统乡土气息的巴山“背二歌”“翻山饺子”“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项目,亦无不秉承延续着巴地古老的音乐舞蹈艺术传统。

毫无疑问,巴文化中“忠勇节义”或“忠勇信义”,“开放包容”“认同中华”的深层因素,已经凝聚成了这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资源体系的价值内核,内涵极其深厚丰富。而由这一内在核心向外层层生发推扩,就构成了圆融博大的精神文化巨型体系,对我们发展巴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而同心同德推动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构建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必将提供深刻持续的巨大支撑动力。

巴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具象的载体,更是多元多样,琳琅满目。如历史上就极其富有特色的板楮、丹砂、巴盐、巴乡清酒,均闻名遐迩,史籍有载。而现代考古发现的罗家坝、城坝、擂鼓寨、月亮岩、断渠、阳八台等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遗址,造型精美的虎纽镞于和戈、矛、剑、戟等巴式青铜武器,以及青铜器物 and 印章上的巴人图语等等,无不反映了巴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须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巴文化遗存至今的物质技术资源极其丰富,实难缕述,限于篇幅,这里谨就巴中市地域范围内的独特遗存,略作述析。重点是见于一个时期以来考古发掘

① 详见拙文《巴中与巴文化的关系之一:巴中在巴国的位置》,《巴中文史》2012年第1期;《巴中与巴文化的关系之二:巴文化的精神》,《巴中文史》2012年第2期;《巴文化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2016年11月5日“中国达州巴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华文化论坛》专辑待刊。

②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8、39页。

发现的大量遗物、遗迹和遗址，和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重要地面文物古迹。

据统计，单是在巴中市域范围内，经过考古调查和试掘，就发现了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迹。其中通江县春在乡擂鼓寨遗址，分布在擂鼓寨北面和南面悬崖下的缓坡地带，总面积约 8697 平方米。文化层深 3 米，共分 9 层，共出土石器、陶器等 20685 件（片），已经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巴州区的月亮岩则是另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渔溪镇酒店场附近方池垭半山坡农耕台地内，面积达 27000 平方米，试掘发现红烧土文化层，出土磨制石斧、砍砸石器、陶片等器物，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南江县断渠遗址位于南江镇城郊来龙山，面积 6300 平方米，试掘发现磨制石器的砺石场一处，出土磨制石斧、石锄等器物，现也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南江县阳八台遗址位于碾盘乡来龙山东段南坡山顶，面积约 7150 平方米，试掘出土磨制石器、刻划纹、绳纹灰陶、红陶陶片等文物，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擂鼓寨、月亮岩、断渠、阳八台等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 5000 年左右，对于研究巴地历史文化以及米仓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上述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等与早期人类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用具，揭示巴中地区作为巴文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可见巴文化的历史源头非常古老。

巴中市范围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面文物和文化遗迹，不仅极其丰富多样，而且拥有许多规格档次甚高的珍品资源。其中尤以古老的米仓道和石窟寺非常重要，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价值。

巴中市著名的佛教摩崖石刻造像，主要见于南龛、北龛、西龛和水宁寺等处。南龛佛教摩崖造像位于巴中市城南南龛山腰，始凿于隋，盛于唐，尔后延续于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现有摩崖石窟 179 龛，造像 2700 余尊，石刻题记 15 幅，碑碣 79 通。南龛摩崖造像不仅内容丰富，造型精美，而且色彩鲜艳，保存完好，是名副其实的“国之瑰宝”。北龛摩崖造像位于巴中市城北苏山坪，始凿于唐代，共有造像 28 龛、348 尊。西龛摩崖造像位于巴中市城西西龛山的佛爷湾、流杯池、龙日寺，现存造像 91 龛，也始凿于隋代而多为唐代作品，西龛造像尤以技艺熟练、多彩多姿、装饰华丽著称。水宁寺摩崖造像则位于巴州区水宁寺镇，同样始凿于隋，盛于唐，多为唐代造像，现有造像 38 龛、316 尊；该处造像保存极好，雕刻精美，内容丰富，享有“水宁寺盛唐彩雕全国第一”之美誉。

以上南龛、北龛、西龛和水宁寺佛教摩崖石刻造像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研究，这些佛教石窟在佛教、佛教艺术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不仅是中国乃至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巴文化地面遗存特色资源中极为突出的亮点群。

米仓道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交通体系起源于史前晚期，到秦汉以降遂成为穿越米仓山和大巴山地，连接巴、蜀和关中、中原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根据笔者近年来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米仓道交通网络体系按从北向南的走向，主要包括五条重要线路。^① 由于米仓道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为巴中和巴文化遗产资源的突出亮点，这里侧重作较为系统的介绍

^① 彭邦本：《米仓道的路线与性质初探》，《四川文物》2013 年第 1 期。

如次:

1. 自陕南汉中市的南郑县出发,向南沿濂水谷道,经红庙、喜神坝、小坝、巴峪关(又称官仓坪)、大坝堡(又称牟阳城)、米仓关、官坝堡(又称关坝)、令牌子坡、竹坝子、柳湾子、上两、桥亭堡、鹿角垭、甑子垭到底塘堡(今南江县城),之后沿巴河(巴江)又曰南江河谷,经南江县城南的东榆堡、石灰堡、八角垭、沙河堡、淘金堡(赤溪场)、马掌堡、白杨堡(下两河口)、元谭堡,复经今巴州区域内的枣林铺、清滩铺、佛龛铺至巴中。这条路沿线历史时期的铺堡地名、地面遗址、遗迹和出土资料等文化资源最为丰富,因而著名学者黄盛璋先生称之为“巴江谷道”中“最主要的一条”道路^①,非常正确。

2. 由南郑县出发一路到达喜神坝后,取道挡墙河、贾家河、崖房坪、台上进入南江县境内,然后经焦家河、麦子坪、老君岩、龙神店、抽筋坡、银杏坡、沙滩、阎王碛、头道水、马跃溪、琉璃关等抵达南江县城底塘铺(堡),余下到巴中的路段与上面第一条路线重合。

以上两线均于南江县入川。以下线路则由通江县入川,并沿其境内的河谷延伸。

3. 自南郑县东南向经祖师殿、高家岭、牟家坝、马仙坝、青石关、固军坝、天池梁、镇南关、羊圈关、西河口、碑坝、朱家坝,循小通江上源碑坝河谷经今诺水河镇,沿着小通江谷道过板桥口、青峪口、涪阳坝、草池至壁州(通江县古称,治所即今通江县城诺江镇),再西南向抵达巴中,或继续沿着通江河(大小通江在县城汇合后统称通江)南达平昌县。此为米仓道的又一条重要线路,古代称之为汉壁道^②,即从陕南汉中循小通江通往壁州的路线。

4. 从古代汉中洋州汉水南岸的西乡县(唐前期洋州治所)南向出发,越岭循大通江河谷至壁州的洋壁道。其线路为:从洋州西乡县溯牧马河(古洋水),经峡口、古代洋源废县、大巴关、太爷庙、白雄关、龙池场、白杨关、长坪、泥溪、苦草坝、碧溪场、烟溪场、瓦室镇、长胜、毛浴镇诸节点下抵壁州。一个时期以来,在陕南城固、洋县一带出土的数量可观的商周时期铜器群,和近年来发掘的城固宝山遗址证明,这里历史非常古老,而且经济文化很早就达到相当水平,其南向通过大小通江河谷与巴人的联系互动,应该很早就已经发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线在洋水源头的钟家沟与大、小通江源头邻接,离小通江上源碑坝河尤近,除经小通江河谷的汉壁道已如上述外,亦可于碑坝西南向经草坝进入南江县境,复经沙坝、贵民、黄泥堡、鹿角垭到南江。历史上亦有从巴州经集州(今南江县)走巴岭路赴洋州,并取道僊骆道抵达西京长安的路线,此线比从巴州经集州、南郑取褒斜道的里程更短,惟因僊骆道之重要性位居褒斜道之后,仍以取南郑、褒斜道赴西京为主。

5. 洋壁道另外一线:主要循大通江的一条支流即发源于西乡县的白石水(蜿蜒于今通江县瓦室镇的鹿鸣村和长胜村之间汇入大通江)一线,与洋壁道合,再抵达壁州。白石水,又名白石川,其上源曰青水(或作清水)。《太平寰宇记》载:“青水,一名白石水,东北自

① 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

②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22页。

洋源县界流入，西南流与诺水合。”^①青水从西乡发源后流经镇巴、万源境，过竹峪关入通江境，因此，此道从洋州西乡源头起，历长岭、索垭、仁林、洋芋塘、九员关、竹峪关、澌波、洪口、沙溪、白石废县（今通江县文胜乡白石寺村）、长胜、瓦室、毛浴，下抵壁州。

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通道的沿线，分布着许多著名的古村镇和古遗址，是广义巴文化的重要资源和重要线路节点。对此，这里亦谨择其要，略举如次：

巴峪关（又名官仓坪）遗址，位于光雾山镇铁炉坝村，是米仓道汉中经小坝至大坝川陕交界的必经之地，是历代官方屯兵管理古道、对过往商旅收税的重要关隘之一。现存关隘城墙维修于清咸丰十年（1860），城墙用规则的条石垒砌，呈弧形，至今保存完好。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牟阳城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南江县米仓山大坝牟家山之南，据研究其始于商周，鼎盛于汉代，其后毁于民国初年，是米仓道必经之地。相传韩信、张鲁、诸葛亮等均曾在此修筑城池，屯粮练兵。通过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各类陶瓷器皿、古代兵器、铜器、银器数十余件。

得汉城遗址，又名安辑寨，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通江县永安镇得汉城村。相传秦末汉初，汉高祖刘邦北上还定“三秦”曾据此以通饷道。南宋淳祐九年（1249）季冬，四川安抚使余玠亲临得汉山视察，命都统张实率将士因险筑垒，创建得汉城，以拒蒙军，宋称四川抗蒙“八柱”之一。该遗址呈椭圆形，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2250米，城池中间高起，四周平衍，设有城郭和东、南、北三座城门，四面均为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小宁城遗址，位于平昌县江口镇小宁城山。宋淳祐五年（1245）建立城池，亦属著名的四川“八柱”之一。该城东、西、北三面临荔枝河，面积约717600平方米。现存东门、西门、北门、南门四座城门，是米仓古道灵山路线上保存较为良好的重要遗址。

巴灵寨，又称巴灵台，遗址位于平昌县灵山乡灵山社区，建于明朝中期，毁于清末。该遗址呈东西走向，占地面积6810平方米，除西门已经损毁外，现存东门、南门、北门及部分寨墙，寨门、寨墙均用条石砌成。遗址北门刻有“清咸丰□□年”题款和房山县知县吴道凝题写的“巴灵台”三个大字。该寨亦为米仓古道灵山路线的重要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寒溪河栈道、桥桩孔遗址，分布于南江县米仓山深处寒溪河与焦家河会流处长约200米的河段。在宽17米的河床上，残留桥梁桩孔4个；河口段左岸、焦家河右岸长约100米的崖壁上，分布有人工所凿30个栈道孔。上述相当规模的木桥及其衔接的栈道，显然是古代穿越深山河谷的米仓道主线上的重要交通设施。

梨园坝古村落，位于通江县泥溪乡梨园坝村。该村落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所建，民居样式风格独特，类型丰富多样，规模庞大，错落有致，农耕文化符号齐全，是巴中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

^①（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四〇《山南西道八》“壁州”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24页。

白衣古镇，位于平昌县，据传始建于秦汉时期，是古柳州遗址和梁代万云郡、隋永康县等治所在地。现存古镇重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镇上分布着规模宏大、气象非凡的三宫六庙和庞大的吴氏官邸及家祠等，雄伟的节孝牌坊则与魁星点斗浑然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古建筑群。

恩阳古镇，位于巴中市恩阳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四川省十大古镇之一。该镇历史悠久，南北朝时期置郡，古称“义阳”，至今已有近 1500 年的历史，为郡、县治所时间长达 800 余年。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所建，是川东北民居的重要代表。

渡水溪古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通江县大兴乡和民胜镇。古道蜿蜒于三山两溪交汇之处，为米仓道通江境内重要交通枢纽段，亦是米仓道道路体系中的重要支线。现存石级道路 500 余米，梯道近 1000 级，残桥 2 座，记事碑 3 通，古道保存现状较好，至今仍有行人往来。

阎王扁古栈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通江县诺水河镇诺水河风景区，很早即为米仓道支线（通江至汉中），唐代为汉壁道路段。阎王扁古栈道现保存有约 1000 米的路段和遗迹，依山沿河而建，以险著称，遗存有木栅栏、石阶等遗迹。

皇柏林古道，位于连接南江、巴中的大路上，从南江城南的镇江庙起，沿着南江河道西岸至下两区柏杨坪。民间相传该古道皇柏林为刘邦所植，或云为张飞所植。道光七年《南江县志》云：“南江城西南东榆铺起，沿河古柏蜿蜒百余里，随山起伏，如龙掩映。土人云：明杨邑令某，植以护山径（亦即通往巴中的古道），勿使洪水啮齿田园，以保民地也。”清嘉庆年间宦游南江的张复旦（淮咨军功议叙正六品即补县正堂）撰《古柏行》咏道：“地虽属民柏属官，官护柏兮民莫残。”呼吁“官民共护成大观”。县令孙菊人的《古柏行》则强调：“敢入森者以刑处！”可见皇柏林历代均属国有，由县令派专人看护，具册交接，有损则须上报，盗伐则律以重刑。近年发现残碑一段，铭曰：“县属松柏大树万株……以保民地。”^①印证了皇柏为国有，皇柏大道为官道的史实。

综上所述，米仓道作为蜀道网络的重要线路系统，其全部现存路线和沿线遗址、遗迹和古村镇，作为系统的文化带及其大小节点，整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犹如一条置于巴文化锦缎上的错金银玉纽带，熠熠生辉，无疑已成为巴中乃至整个巴文化资源中亮点富集、最为光彩夺目的线性遗存带。在米仓道已经正式列入国家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线路遗产预备名录的背景下，认真研究、梳理和合理利用好这一极具独特性的系统资源，必将为巴中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三、巴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共享开发

巴文化作为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的区域文化，不仅久已融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宏大体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为典型的雅俗共赏、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有机融合体，既多千里同风的所谓“下里巴人”，亦富含典雅高洁的“阳春白雪”。如何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这

^① 南江县志编委会：《南江县志》，成都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32~233、703 页。

一极具特色的丰富资源，以为古老而充满青春活力的传统巴文化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提供共享发展的持续有力支撑，是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认真研究、妥善处理的课题。这里亦提一些初步的看法和建议。

1. 巴文化资源的保护

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性、基础性支撑条件，不可或缺。

很多资源都是一次性的，而且长期使用之后不免产生和积累一些环境生态方面的问题。可是文化资源不一样，生生不息，只要会用善用，越用越丰富，越用越精彩，越用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文化全面融入和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与之相应，从长远看，对于一个城市或区域来说，其最具特色的资源，亦即最能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往往就是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于巴文化这样极其丰厚而独具特色的资源，我们作为巴人的子孙，首要任务，无疑应是责无旁贷地珍惜、保护好它。当今社会，城市化发展非常快，城市越发展，上述资源就越彰显其珍贵价值。但在许多发展很快的地方，这类资源已经或正在迅速湮没消失，由珍贵变得愈益珍稀。巴文化区地处中国西部，属于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后发地区，因而有幸保留下来较多的传统文化资源，恰好可以把后发劣势转变成优势。我们应该赶超世界大潮，把文化作为灵魂，越来越深度融合到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之中，使之成为提升发展品质、提高发展的综合效益的核心要素。因此，作为后发地区，我们的发展不宜简单沿袭先发达地区依循发展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实现经济腾飞的老路，否则容易陷入再努力追赶也总难以赶上的落后地位。一定要审视清楚天下的发展趋势，洞悉自身在天下发展格局中的位置，紧密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尤其是发挥好自身文化资源的优势，培育升华自己的唯一性特色，通过错位或差异性新路径，来实现创新式跨越发展。

就巴文化区域而言，怎样才能保护好传统文化资源呢？这是本区域内现今很多地方都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紧迫的课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一个系统的巴文化及其资源的保护和发展规划。如此则需要先行组织力量全面梳理、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尽可能彻底摸清本底。这既是一项需要时间、经费投入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一项地方或区域务必先行实施的公共工程，千万漠视不得。此外，对于巴文化这一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这里谨提两点具体建议：

第一，巴文化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下和地面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在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城市急速膨胀、城市化进程呈加速度跑步前进的当今，要尽快采取重大措施加以保护。根据全国相关地区的先进经验，首先应加强考古和文保工作。如何加强？实践证明，光靠国家层面的文物保护法是不够的，应进而从地方立法入手，制定和完善城市或区域的相关法规。尤其要避免和杜绝过去基建先行的做法，总是在破坏性地挖出了古代遗址、遗物或遗迹以后，才慌忙进行抢救性发掘，非常被动，结果往往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为此，应该尽快通过政府或人大启动立法，严格规定在所有建设项目的建设工程动土之前，必须首先由考古和文物部门先期进行文物考古方面的勘察试掘，以避免历史文化资源横遭破坏和流失。这方面的典范城市，如洛阳、成都等，都已有相当成功的立法业绩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

第二，各地城乡往往存在许多具有重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房屋等建筑物、构筑